

双向书写——一种民族志方法的可能

龙晓添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摘要: 本文讨论了科学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关于书写问题的分歧。在此基础上, 试图适当地改变书写主体, 提出一种双向书写的民族志的新尝试。这种方法主张将被研究者纳入书写工作中, 让其参与到文本的书写过程。试图在一个文本中进行双视角的书写, 换个角度去实现民族志的“本真性”。

关键词: 双向书写; 民族志; 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2)03-0038-04

Bidirectional Writing: A Possibility of Ethnographic Methodology

LONG Xiao-tian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divergence of writing between scientific ethnography and post-modern ethnography. On this basis, in order to change the authors of writing, it puts forward bidirectional writing of ethnography. This methodology holds that subjects should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ext-producing, that is to say, bidirectional writing in one text can realize “authenticity” of ethnography.

Key words: bidirectional writing; ethnography; authenticity

在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一直因其难以通过科学的手段保证真实性和客观性而饱受诟病。针对这个问题, 格尔茨在其著作《地方性知识》提出了一套“深描”理论: 人类学并非一门发现真理规律的科学, 而只是对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度阐释, 以便让人能够接近事实本身。但是, 这样的辩护仍旧无法帮助人类学退守住自己的领地, 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合法性面临挑战。本文尝试在对民族志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方法论视角。

一、民族志的书写困境

(一)“真实性”面临的挑战

人类学自诞生以来, 民族志研究就一直把记录和反映“真实性”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出—个中心问题, 即关于在一个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1]然而, 面对现代社会“移动性”和真

实“多样性”, 传统民族志研究范式一方面受到“效力和信度”的考验; 另一方面, 民族志研究必然也将引来另一个革命。^[2]

人类学的“民族志”, 最初是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记述方法。科学主义兴起后, 民族志演变成为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之后, 科学主义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民族志又转向了一种去科学式的转向。高丙中在《写文化》代译序中将民族志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时代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 这一时期没有方法论上的指导和要求。^[3]

在第二个时代, 也是民族志确立其科学地位的—阶段。20世纪初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经典民族志作者提出以“科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志, 并自信获得了一种纯然的“客观性”, 他们所撰写的民族志是一种以客观体为中心的—民族志形式。这实际上是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社会科学。其

收稿日期: 2012-03-02

作者简介: 龙晓添(1980-), 女, 湖南长沙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民俗学博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

表述方法是“第三人称、外部描写的、纯客观方法的、语音学的、行为性的、遥距感知经验的”。^[4]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田野工作图景(孤独的白人男性田野工作者与土著村民生活一年和一年以上)已经成为标准科学人类学实践的原型(archetype),至此,田野工作成为了人类学家的“通过礼仪”(rite of passage)。^[5]

在第三个时代,是科学民族志受到攻击濒临崩溃的阶段。当以实证主义为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民族志产生危机之后,科学权威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受到广泛批评,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替代方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6]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超然的人类学客观性仅是一个神话。无论经典民族志的作者如何虔诚,他们并不能排除自身知识结构、理论视角、情感趋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所有研究中,主观因素都注定要渗透解释和观察之中。^[7]人类学要求民族志作者用“本地人眼光”进行叙述,用“第一人称的”,“内部描写的”,“认知性的”方式进行书写。^[8]经典民族志对客体关注的所谓“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在后现代民族志中转变为“把关于对象的知识建构过程作为他们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思他们自己的知识活动的实践的和客观的条件”。^[9]后现代民族志认为最简单的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识的创作,民族志文本的撰写总是卷入了“自我塑造”的过程。甚至有人认为人类学在本质上是文学的,最好的民族志文本是对真实的虚构。^[10]这意味着对民族志科学立场彻底的背弃。

(二)书写者的身份争议

后现代主义对民族志真实性的冲击让人类学方法论面临极大挑战。格尔茨指出,在为田野工作的诸多问题困扰良久之后,对人类学来说,现在是认真对待作家身份的时候了。实际上,真实性问题的背后是关于书写者身份的问题。换言之,书写者的身份才是解决民族志真实性争议的关键所在。后现代主义指出,学术文本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放在极不对称的关系上。在研究者书写的文本上,“被研究者在明处,他们的声音被驯化;研究者藏在暗处,处于控制地位,是中立的超然的。因而研究过程就以不诚实的、道德上可疑的方式呈现出来:掩藏了研究者的角色,掩饰了他或她的主观性及往往是独断的举动。”^[11]有人已经发现书写者的霸权带来的消极后果。理查森发现,由于霸道的写作风格的缘故,涉及她很感兴趣的题材的那些书,描写的一切都是被动的,沉闷的,乏味的很。^[12]

在研究中如何处理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

不仅是民族志方法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难以回避的问题。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关系,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是不可跨越的,通过主客关系的界定来保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致性。而与此相反,后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等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都一定程度地以交互的方式进行研究,换言之,主张一种主体间的关系。比如诠释学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建构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主张以互为主体的交互方式,用诠释的或辩证的方法,创造出主观的知识。而批判理论也认为人类社会中所谓的“实在”,其实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以及性别价值所形塑而成的一种“虚拟的实在”,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凝固而成的。因此他们也主张以互为主体的交互方式,用“对话/辩证”的方法,获致一种承载有价值的主观知识。^[13]

那么,在书写民族志的时候到底坚持主客关系的科学态度,还是主体间关系的伦理态度?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必须找到一条中间可行的道路来解决这一矛盾。

二、双向书写:一种新的书写探索

将眼光仅仅局限于书写者的身份,依然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无论是科学民族志还是后现代民族志,都是一种“主体民族志”,无论是第三人称的外部描写还是第一人称的内部描写都无法避免书写者“代言人”的角色。因为这二者是基于研究者的观察和理解,始终以我为主体。尽管后现代民族志愿意自我反思和设身处地的想象,但是它仍然不能给被研究者充分的话语权。而且,后现代民族志由于过于关注研究者自身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而始终无法回答民族志如何才能更为真实的问题。而且,仅仅靠对主体的自我反思是不能解决民族志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危机。因此一般而言,由于民族志客体都是被主体建构出来的,故而上述两种民族志都只能是“主体民族志”形式。^[14]

因此,就民族志而言,只有跳出主体民族志的范畴,才有可能避免“一厢情愿”的偏见。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双向书写”的民族志方法。

双向书写的本质性特征,亦即其区别于以往民族志的根本因素,是邀请被研究者参与文本的书写。以双向写作的方式实现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视域融合。此时的民族志作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邀请被调查者参与到民族志的写作中来,这样不仅在田野调查中能打破主客体间的对

立,跳出书写者的身份困境,以双方不同的视角展现文本,进一步接近文化的“真实性”。也就是说,民族志的反思不仅仅存在于书写者自身,而应该赋予被书写者以主体地位,让他从一个被书写者变成书写者之一。这样的结果是:文本一方面是调查者眼中的“调查”,一方面又以被调查者的视角来审视调查者的调查,以及他们自己对本文化的认同与思考。

这样的文本不再是被动、单向的。读者不但能够在文本中体验到被呈现出来的“对话”,更能够看到作为书写者的被研究者。这样的文本一下子就鲜活起来了,民族志的“真实性”也自然地展示出来,由读者自己去解读。在阅读以往的文本时,读者要想达到真实的认识,就需要解读那些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规定这些资料之意义的话语或符号系统。但是,双向书写的文本,“我”和“他”在文本中一起展示各自所理解的意义,在文本对话中诠释文化中的话语与符号系统,自己已经跃然纸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向书写实现一种常识性的超越,是一种“生动的民族志”。

三、双向书写基本方法

然而,要完成双向书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有必要就这一方法在操作层面的要求上做一些交代。以下将提供一个适合文化研究的双向书写的方法设想。

(一) 双向书写的田野基础

双向书写适用于那些普通文化知识相对普及的地区。而实际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类似马林诺夫斯基和西太平洋海岛居民之间的巨大横沟已经被历史填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文本交流已经出现可能。特别是当前人类学的本文化视角研究越来越普遍,都市人类学等新兴人类学的领域也被开拓,对于这些领域文化研究而言,双向书写应该是能够实现和适用的。

(二) 研究者的书写

双向书写中的“我”依然像以往民族志写作那样,在研究者自身的理论解释之下,涉及研究框架,在自己的话语特点之中,通过与研究对象的持续对话建构文本,在主客位之间不断地反思,尽力呈现“我”所看到的理解的意义。研究者在书写时不断与被研究者交流所观察到的现象。

(三) 被研究者的书写

被研究者的书写是双向书写的特色。在文本中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一部分内容展示出来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1. 双向书写的形式

最可行的方式是在文本的书写,也即一项民族志研究基本完成时,研究者带着整理好的文本再付田野点,然后将文本交给被研究者阅读,采集对方的意见,并做记录。这时,“他”以自己的文化视角自己的诠释立场,去审视“我”关于“他”的文化书写,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与此同时,提供其对“我”的调查对象及调查本身的想法与思考。这样民族志不仅呈现“我”在主客位、事实与建构、科学与艺术、中立与介入间的反思与对话,更能获得“他”对“我”及“我的研究”的思考,以及“他”以最自在方式表达出的本文化。将“他”的表达附在“我”的表达之后,不加修改不将之融合,只将这种“矛盾经验”展示出来,“真实性”由读者去辨析与探索。在采集完成后,研究者以注释、章后附录等形式将被研究者的意见放到文本中。

还有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是即时交流。这需要一位(或者几位)地方性知识掌握者作为另一个书写者,也就是说,在你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有一位(或者几位)当地人参与其中,在书写时,将他的意见直接在行文时录入,并加上注释。这样可以实现研究者文本书写即刻还到研究对象中,能实现“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与“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这两种取向更好地融合。如此,不仅在研究中理解研究对象对自身行动的实践性把握,通过与研究对象持续对话建构文本,并将民族志写作这一知识生产活动定位到已有的理论解释中,撰写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文本。^[15]

2. 第二书写者的选择

在研究对象中怎样选择书写者呢?一方面,书写者应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能与研究者的整体研究对话。另一方面,要考虑书写者与本研究的关系。研究对象中的书写者不同于调查中一般环节的被研究者,其需要占据主要的调查环节,对整个调查起到关键作用,对调查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所以书写者可以是地方精英,因为他们掌握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知识水平也有保障。也可以是研究内容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们对具体的知识操作非常熟悉。

书写者可以有多个,这样展示的对话会更丰富。但多个书写者之间的关系是要具体谨慎把握的。他们可以是属于同一研究内容中的不同类别中的。也可以是在不同层次之中,如以某一个地方精英为和某一个环节中的关键人物为书写者。如此,书写者并没有固定的选择,要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去选择和安排。

四、双向书写的意义

(一)身份的拓展

双向书写使书写者、被书写者和读者三方的身份发生了革命性的调整。首先,书写者主动解除了自身的话语霸权,规避了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同时又保持了自身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其次,被书写者获得了参与书写的权利,也兼具了书写者的身份,同时又是第一文本的读者,他从一个被动的身份转变为主动的身份;最后,读者获得了两个视角,有了可以比较的参考,看到得不再是一家之言,而且从这个比较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这样,双向书写在书写者、被书写者和读者之间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话语平等,被研究的文化成为一种共建的理解。

(二)真实性的回归

双向书写是自我与他者的双向诠释。首先,双向书写视角无疑能够扩大民族志“部分真实”的范围,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真实性”。第二,双向书写能够把本文化和他文化两个视角结合起来。“我”和“他”不仅在调查中对话,更在文本中对话,调查者的“诠释”,被调查者再诠释此“诠释”,并提出自己理解的本文化。最后,双向书写还实现了文化的“本真性”理解交由读者去权衡。

五、结语

科学民族志阶段的人类学家,因自身与被研究者之间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自觉地选择了科学的立场。随着现代性席卷全球,文化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很难继续坚持原先的科学立场,这正是后现代民族志兴起的背景。我们提出的双向书写,旨在为民族志在当前的条件下找回科学的地位。以这样一种方式在科学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之间达成和解。和解本来就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特别在讨论真实性问题时,这一实用主义的概念更为实用。如果我们接受和解的态度,那么就会承认“真实性”永远处于变化之中,那么,民族志对它的反映和解释亦在过程之中。这样,民族志研究的历史也构成了另一种“真实性”的流动的样态,包括认知理念的时代性样态,实践原则的差异性样态,以及反映在民族志写作的范式性样态等;这些不同的样态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外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

双向书写是一种对民族志“真实性”的进一步探索,一种研究方法和文本结构上的创新。当然双向书写只是笔者的非常有限的思考,仅仅是一种

民族志书写的尝试,虽然笔者正将这种尝试付诸于实际的田野调查,但很多思考还很不成熟,比如被调查者中书写者的具体选择方法还不周详;其完成书写的可能性有待实践检验;不同书写者之间的矛盾、异议;双向书写对民族志文本结构的整体性的干扰;以及不同研究内容的民族志在运用这一新方法时的差别,等等,所有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 [1][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编.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8.
- [2]彭兆荣.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6:138.
- [3][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尔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代译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4][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72.
- [5][美]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M].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3.20.
- [6][15]沈洪成.民族志的三重性:科学、反思与行动[J].青海民族研究,2011,(1).
- [7][美]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王卓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78-279.
- [8][10][14]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J].民族研究,2011,(3).
- [9][美]保罗·拉宾诺.布尔迪厄.跋,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56.
- [11][瑞典]麦茨·埃尔弗森,甘会斌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32.
- [12]Richardson, L (2000)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K. Denzin and Y.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pp. 924.
- [13]黄国光.社会科学的理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21.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张云海]